

乡村发展报告的又一力作

——纪红建、欧阳伟《山村中国》读后

□刘月娥 章罗生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关农村改革与“三农”问题等始终是其重点之一。这一点，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与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到世纪之交杨豪的《农民的呼唤》，再到近年的“精准扶贫”题材创作热等，均可清楚看出。而纪红建、欧阳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村中国——闽南乡村发展纪实》即是近期这方面的又一代新作之一。它不仅与其他同类作品一道，共同推进了有关“三农”题材创作的发展，而且与作者的《乡村国是》等相互补充、映衬，是其有紧密关联的姐妹续篇。

在主题上，虽都以中央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等为背景，着重反映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但《乡村国是》等更重扶贫现状与问题探讨，而《山村中国》则更重历史“发展”与现实报告。具体而言，它以习近平扶贫理论的早期生发地和实践地——福建边远山区的军营村与白交祠村为范例，通过它们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近年在“精准扶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厦门市乃至闽南、福建改革开放的整体形势。其中包括人们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痛苦、彷徨、思考与奋争，即过去的苦难与迷惘、挣扎与奋进，现在的拼搏与窘境、思考与探索，尤其是习近平先后两次去该地访问困苦，并作出“山上戴帽、山下开发”“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等指示，从而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等。

其次，在形式上，《乡村国是》与《山村中国》等都通过作者的深入采访，将其见闻与真实情感等相结合而进行及时报告，但《乡村国是》立足全国、放眼各地，是名副其实的“宏观综合”，而《山村中国》则立足两个山村，放眼厦门，透视闽南与全国，是以点带面基础上的“综合”与典型叙事。它虽只以两个村为重点，但由于在时间上涉及新时期前后的40多年历史，在人物上不仅写了两村的众多党员、干部与村民，而且涉及乡镇、市县等不少领导，因而其量大面广、内容繁复，也须“综合”、选择，尤其是须注重典型描写。如此，作品就立足底层叙事，将改革尤其是“扶贫”战略背景下的山区小人物作为重点对象。其中既有个性鲜明、情怀宽广的普通百姓，也有立志改革、带领村民走出困境的基层干部，还有投资山村、致力乡村发展的企业老总等。他们在扶贫攻坚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情绪、坎坷经历与观念精神等，构成作品的主体内容与情感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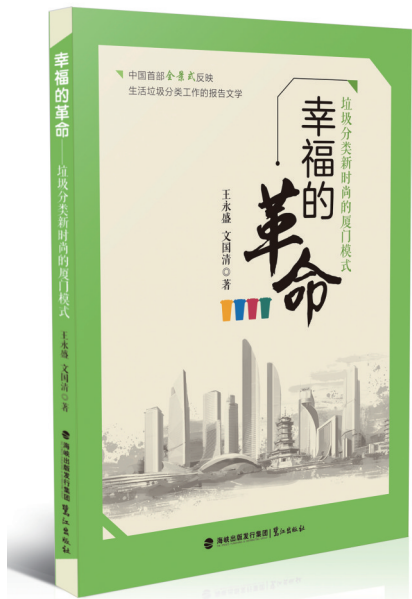
正是如此，作品写到，杨再添在“地瓜当粮草，孩子当背包”的改革开放之初，一家五口全靠买卖木炭维持生计，却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被免去村支书且被开除党籍；苏德水不同意出让自家菜地以修建文化广场，与老支书展开较长时间的“拉锯”，但最后却忍痛割爱、默默奉献；尤其是退伍军人高求来（军营村原支书），放弃进城工作之机而毅然回乡，立志带领乡亲们拔掉穷根。他身体力行，排除万难，建水库、修山路，开荒种茶、种果、建学校，开通村民医保及乡村旅游等，解决了出行难、用电难、入学难、就医难等一系列生活、生产问题，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担当。此外，还有从废品收购员变为超市管理员的杨阿英，从手工制茶迈入机械制茶时代的苏德水、高水庆，实现户户通水泥路、高山上架电话线，打造七彩池、雄狮瀑布、防空哨所的高泉阳，开设第一家农家乐、带动乡村旅游业的高金彪，开设农村淘宝店销售茶叶、地瓜等土特产的年轻人苏银振，打造厦门高山区度假村的厦门军管红文化旅游公司的曾总，为乡村建设献计献策、敢想敢干的大学生村官黄捷、曾国跃等，更融汇成振兴乡村经济、促进文旅发展的强劲洪流。他们既有农民的朴实、诚恳等美德，也有传统的狭隘、保守等局限；既有渴望创新、改革发展的锐气，也有遇到挫折、困难时的徘徊与消沉等。正因为作家抓住人物心理，解读他们对改革时代的感受与认识，尤其是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与追求，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多面等，因而人物真实、可信，人情味与乡土气息浓郁。

与此相连，在内容上，《山村中国》不但更敏锐地反映了高山村民要求改变贫穷的强烈愿望和勇气，而且展现了他们在变革中所产生的新思想与新观念；不但更具体反映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改革和变化，而且更集中描述了闽南山区乃至厦门、福建的历史、地理、风俗与自然景观等。在这方面，作品除穿插较多神话传说与诗词典故外，尤其表现在生态环保与茶叶生产、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方面。如其中写到，苏银振建立农村淘宝店，为土特产生产销售打通渠道；村委会为规范管理农家乐和民宿，设立旅游股份合作社；农家乐老板高树籽继开茶店后，又利用废弃猪池养鸡鸭、开挖鱼塘，摸索开发40多种特色菜品，建果园让游客体验采摘；李仲树虽人在香港，但始终牵挂家乡，其金日集团是福建省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药品与保健品生产企业之一。尤其是在茶叶生产等方面，杨金榜、高树足等公司老板，引领村民从手工制茶到机械制茶，从个体卖茶到合作社批采与批发，再到互联网淘宝销售，加快旅游开发带动土特产营销，搭乘新农村建设的幸福列车创造“最美休闲乡村”等。总之，军营村、白交祠村已从脏、乱、差、穷的偏僻山村蜕变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文明示范村；厦门“离天最近”的村庄有了“离天最近”的气派，村民们开始懂得讲究生活的品质和心灵的高地了。而在写这一切时，作品也写到黄巢、杨六郎、朱熹、郑成功、林则徐、王步蟾等历史人物及其诗文与传奇故事，说明“每个村落都在形成、变迁和发展中都具有一定价值的历史记录，一部村史就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也说明追求幸福、富裕与文明、进步，是人类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等。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除自由、灵动的散文笔法外，作品在语言与叙事风格等方面也较有特色。作者尽量使用当地语言，并以口述实录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地村民之间，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找感觉寻痛点，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同时，又“出乎其外”，使自己立于改革开放与脱贫攻坚的时代大背景下，以思想烛照历史，将感觉升为理性，从而使作品既真实生动又不乏思想启迪，既接地气又有艺术感染力，让读者觉得既真实、可信又亲切、好读。而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其饱蕴的思想哲理等。这一点，除每周开篇的精美引语外，更突出表现在作品中穿插的理性议论等。作者在写人叙事的同时，既有对有关农村发展与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总结、点评，如“新时代遇见新乡村，新风貌展现新活力”；“金钱扶贫只是输血式扶贫，产业扶贫才是真正的造血式扶贫”；“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澎湃绿色发展力量，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乡村建设与自然生态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结合起来，已成为厦门新农村建设的‘主流’”等；又不时穿插着人生感悟与哲理思考，如“一本村史、一座老屋、一个哨所、一段传奇，留住了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脚印，诉说着乡愁乡恋和地久天长”；“人人都有欲望，有时候，欲望是隐藏在人们身体和内心深处的魔鬼”；“船到中流，人到半山，尤需勇立潮头、奋勇搏击”；“做茶如做人，做人要正正方方，做茶要做真正的有机茶园”，如此等等。此外，在叙事上，作者将“全知”与“限知”相结合，即既有全景式的全景鸟瞰，也有村民个体的独特自白；既有对群体素描，也有典型形象刻画——其中尤其是对推进高山村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词高求来着墨颇多，通过众多事例，着重突出了他引领村民同传统观念决裂、与旧生产方式告别，从而逐步走向现代文明与富裕之路等。同时，作者在对高求来作全知叙事时，又通过高水清、高水清、高志强、高树根等人的讲述，从不同方面对他进行多方观照。正是如此，一个鲜明、高大、立体的共产党人形象才树立起来。与此相连，作品还注意运用白描手法展现外貌、神态、对话和细节等。

当然，“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作家必须“主体虔诚”，有沉重的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因而作品也不乏问题探讨与对策研究等。如作品指出：尽管目前高山村民生活惬意、经济富裕，但依然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成为乡村主力军，如何让“乡村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守得好，让外面的有志青年想进来、愿留下、发展好，这是乡村的忧患；时下脱贫攻坚中跟风现象较严重，独创性的东西较少，可复制的地方不多；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在“精准”二字上下功夫，唯有精准，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真扶贫、扶真贫，方能真脱贫、真富美等等。

总之，《山村中国》等同类作品相比，《山村中国》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以扎实材料、多样手法与独到思考，通过闽南两个高山村的发展变化，以点带面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村脱贫攻坚的非凡历史与最新面貌，从而具有较深刻的政治、现实与文学意义。同时，作品也较好地发挥了作者的创作专长，能立足现实、反观历史，在较广阔的时空中发掘思想哲理，概括与提炼时代精神，体现了其不断创新、力求超越的可贵品质与艺术功力。



性。但是，这个观念看法需要调整丰富和超越。当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开始尖锐对立起来的时候，文学只是在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着力创作的话，就明显与这个时代环境不相适应了。如今，在对于人的相互关系进行个性探讨表达的同时，还更需要面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积极探讨人类如何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课题。近些年来出现的名为“生态文学”的创作现象，就是向这个领域走近的积极努力。

这部报告文学名叫“幸福的革命”是很有想法的。垃圾分类、科学处理，使废物再生、合理再用，即是一种人类保护创造幸福生活的革命性行动，这个话题本身已经是时代前沿的课题。作品叙述的“厦门模式”，已经在这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了经验，虽然还存在不足，但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文学应当密切关注和介入的对象。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还够不上更高文学性表达，可它对于文学如何参与社会和人生发展，积极投身时代前沿生活，明显具有重要的价值。

热忱的回望

——评报告文学《幸福的革命》 □蔡凝香

在习近平总书记“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倡导下，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厦门作为46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试点城市之一，取得了历次考评均名列第一的佳绩。在这过程中，厦门以高度的行动自觉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率先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并创新探索出一批成果经验。在当下全国垃圾分类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这部全面反映厦门垃圾分类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幸福的革命》的面世可谓恰逢其时——总结梳理厦门垃圾分类工作经验方法、分享传输可供复制借鉴的厦门模式，推动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深入、助力实现绿色美好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要从根本上改变甚至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习惯，不亚于一场飓风般的浩大革命，故而垃圾分类工作有着其他一般性工作所不可比拟的复杂性和持久性。而这，也决定了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准确、明晰的阶段性叙述有多么不易——既不能流于总体工作表面性的慷慨陈词，也不能对细节丝毫不含混不清的叙写不明。选择一个前所未有的被涉猎的题材领域，对记录者而言是难题挑战，更是挑战。本书的两位作者满怀热忱，历时10个月深入街道、社区、农村、厂区等基层一线，耐心细致采访了300多人次，形成厚达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并以诚恳、精细的笔触，生动、立体的描摹，将凝练了大量垃圾分类工作实践智慧的厦门经验浓缩于本书中。书中论及方法、机制、亮点、对象……阐述之全面、完整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几点感受与读者共赏。

坦然的真实性。当然，真实性本就是报告文学的第一要义，这种因体裁而具备的原有姿态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为什么说坦然呢？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于非虚构性场景、细节的还原度，全在于大方抑或扭捏的取舍把控之中。一个并非关键性的细节存在与否，倒反而能感受到不同作品之间有所区别的情感和温度。书中有一个细节：有些居民从一开始觉得政府统一分发的垃圾袋质量极好，因此不用来装垃圾，反而用于食物包装放进冰箱。读到此处不禁莞尔，一本严肃的报告文学中，陡然就萌生了几分带有生活趣味的可爱。作者并没有把这个看似作用不甚大的描写弃去，而是毫无保留地分享。书中，还能在若干不经意的角落发现这样的坦然可爱。

细腻的文感性。很多读者会认为报告文学具备文学性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它大都是冷静、客观、理智的，唯独和温暖的文学性好像天然存在隔阂。其实不然，就以此书为例，书中采写了数十位人物，包括各级领导、社区书记、企业人员、学校师生、督导员等，群像性的写法是有风险的，一不留神就容易显得杂乱且雁过无痕。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精心裁度，对保留下来的采访人物

都名列第一。在不断的探索中创造形成了很多创新经验，被认为是“厦门模式”，上海等地都派人来学习取经，这无疑是令人欣慰和高兴的现象。

王永盛、文国清的长篇报告文学《幸福的革命》，主要是呈现厦门垃圾分类的开始、过程及效果。文学叙述表达的信息、内容非常密集，虽然还未抵达精到和艺术的高层，但是在细致准确地传递实施方法的角度上，却是全面充分和精彩的。两位作家在10个多月的时间内，对厦门市许多地方的相关人物、事件进行采访，创作的求实求真和用心的行动态度应当点赞。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作者发现，这个被认为是“小事情，大工程”的对象，包含着非常丰富和精彩的思想与人物故事内容。如何将些丰富内容顺畅传递表达，确实需要一番努力。作者以“第六章+启示录+代序、后记”的方式，分别从提高对垃圾分类、科学处理的意义作用价值认识，到开展落实“五全工作法、七个相结合”的先进工作经验，在解决好“五个链条”和“五大关系”等方面展开，书写了厦门多年来，在领导牵头决策、立法定规、设定标准、科学构建设施，完善推进程序、专业人员全力参与、发动人民群众共同行动、开展丰富多彩教育宣传活动、调动企业投入积极性等方面，创造了厦门市在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方面的全国性先进模式的情形。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金安等厦门市6个市区以及街道、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者及各级市、区、局部门领导和无数个普通民众典型吴丽凤、陈金德、晏雪飞、郑山君、刘捷、晏子娟、吴丽敏、林淑丽等的努力奉献，热情参与，人物的精神情感、韧性性格的生动描述等，都使得这个“厦门模式”充满了创新能动的力量，包含着丰富的精神与情感温度。

此前，文学是被认为以自己个性的特点作用参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看法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合理

超越困局的幸福脚步

——读长篇报告文学《幸福的革命》 □李炳根

伴随着人类的进步，科技发展，社会改变，生活时时都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不断追求生活舒适简便和创造着大量新的财富内容的时候，各种垃圾也在迅速地增长和严重构成威胁。王永盛、文国清在他们的报告文学《幸福的革命——垃圾分类新时尚的厦门模式》中写道：上海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体量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北京每年产生的垃圾可以堆成一座景山、厦门每年产生的垃圾体量是两栋300多米高的高楼体量。垃圾处理几乎是所有城市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垃圾对于城市和人们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过去，人们总是用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但如今看来，这绝非长久之计，而且遗害深远。不少的地方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害，瑞典、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在这方面都已有了教训。可是，垃圾在日日产生，怎么办？如今，实行垃圾分类、开始科学处理、进行废物利用，是人们找到的一种有效的科学处理方式，让垃圾成为“再生资源”更是一种新的世界潮流。

2000年6月，国家建设部确定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着手垃圾分类处理的工作。其实，早在198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制定纵跨15年的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对垃圾处理的问题有了认真的对待。建设美丽厦门，改善垃圾粗放处理，在当时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习近平还讲：“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所以在厦门被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加紧推进此项工作的时候，就好比顺水推舟，更加深化了推进的过程。如今厦门在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方面成为先进，在全国46个试点城市考评通报中，历次

经验总结与典范示例

——《幸福的革命》的重要意义

□徐刚

前段时间，关于上海垃圾分类的种种举措引来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的“强势围观”。一时间，何为“干垃圾”，什么又是“湿垃圾”？令人颇感迷惑。这里固然显示了人们对于陌生事物的疑惑与抵触，但在玩笑过后，冷静之余，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垃圾分类时代已然来临。其实多年以前，党中央便高度关注垃圾分类工作。早在2016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便明确要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自此以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进相关工作。在各方努力之下，中央单位率先垂范，46个重点城市示范引导，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并初步取得了相关成效。

作为国内首部全景反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王永盛和文国清的《幸福的革命：垃圾分类新时尚的厦门模式》便是以这46个示范城市之一的厦门为中心，向读者介绍厦门垃圾分类工作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相关事例。这既是以“厦门模式”为个案，总结时下极为重要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宝贵经验，也能充分展现厦门这座城市的文明风貌和人文底蕴。

《幸福的革命》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采访资料的翔实和丰富。作者用近一年的时间进行采访和创作，不仅从政策层面、组织层面，向社会大众分享厦门垃圾分类工作的顶层设计，而且还以一大批鲜活生动的案例，介绍奋斗在一线的垃圾分类工作者们的辛勤工作情况。我们注意到，整本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千人，再加之裁剪修饰，原始素材只多不少，足见作者用力之深。正因为如此，整本书几乎都是用生动的个案连缀成篇的，读起来当然不会枯燥，这在政策引导类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极为难得。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全国人民都在狠抓经济建设的时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在近年来的中央文件中，环保的话题逐渐引人注目。这也与我们今天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现实息息相关，正如媒体所报道的，“垃圾围城”的境况绝非耸人听闻，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垃圾处理成熟的方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当此之时，垃圾分类无疑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措施，这既是地球减负，也是为人类谋幸福，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该书也解释了试点工作何以选择了厦门。如作者所言，厦门这座城市，面积不大，文明素质却很高。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四连冠”，厦门具有“当代中华文明之冠”的美誉，再加上“中国人居环境奖”“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等重要名片，将之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试点城市，市民素质这一关显然不会有太大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厦门就曾作为八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这对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正是以“厦门模式”为例，本书为我们详细展开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经验。这在目前垃圾分类已然从厦门扩展到全国，在众多城市艰难展开之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值得借鉴的工作方法。就“厦门模式”来看，最重要的经验当属第一章中提到的“五全工作法”。如书中所言，为了充分应对这一划时代的艰巨工作，厦门在市委市政府的牵头下，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努力达成了全民参与、各部门协同、全流程把控、全节点分类，以及全方位保障的工作态势，这就是所谓的“五全”工作法。此次垃圾分类工作试点堪称“一把手”工程。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市长、市委副书记任工作组组长、常务副组长，市委四大班子一把手各司其职，全力推动，层层下压。接下来便是在各区县全面推进。一时间，从海沧、集美、同安，到翔安、思明、湖里，甚至至宗教场所和部队军营都不例外，真正做到了“岛内外”全覆盖，让垃圾分类工作无死角。

整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当然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城市的核心是人，垃圾分类关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如何发动民众参与，永远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古往今来，移风易俗的工作最难开展，这需要时刻与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作斗争，所以，以足球一样，垃圾分类需要“从娃娃抓起”。为此，厦门市由教育局牵头，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开展了与垃圾分类相关的既生动有趣又极富教益的教学活动。这包括编写垃圾分类教材，启动“垃圾分类小手拉大手”主题实践活动等等。这一部分，书中有着详尽而生动的论述。比如，秀德幼儿园、厦门十幼、江头三小、湖里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的师生们，都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实践课。其中，厦门二十中的实验转化课《拆解锌锰酸性电池》令人印象深刻，它让学生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通过这种课堂上的系统学习来迅速普及垃圾分类减量知识，这便呼应了湖里实验中学王明杰校长的初衷：垃圾分类进校园，不仅是对孩子进行教育，而是要让孩子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熏陶之下成为教育的场所，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最后引领整个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

《幸福的革命》让我们看到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件造福子孙、利国利民的大事，却又是极为艰巨，需要长期坚持、不断投入的大工程。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划时代的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这场有关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革命，通向的是我们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一场幸福的革命。